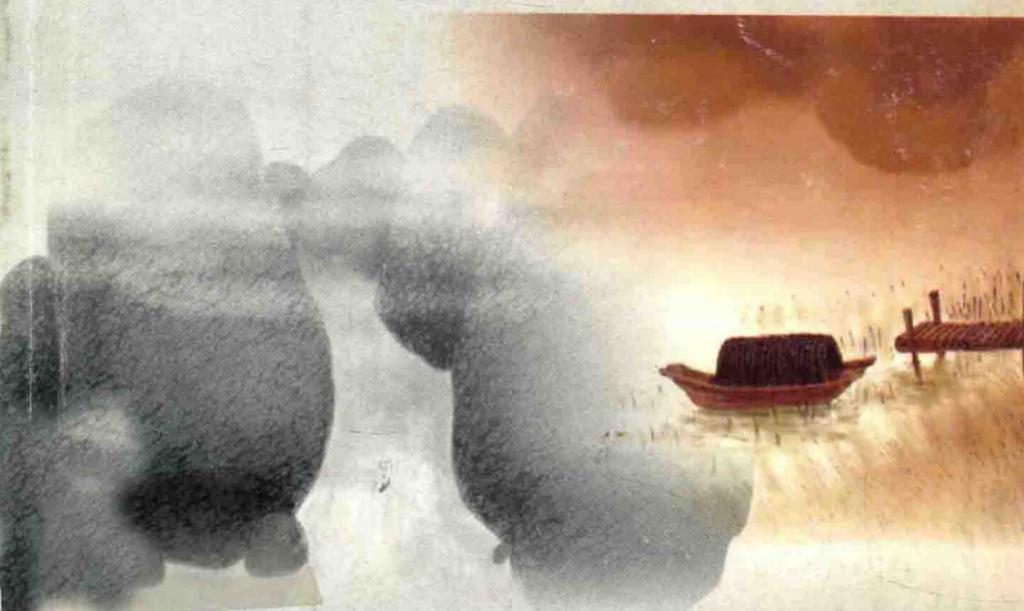


铜仁地区

当代作家

评传

郭征帆 著



贵州省 2002 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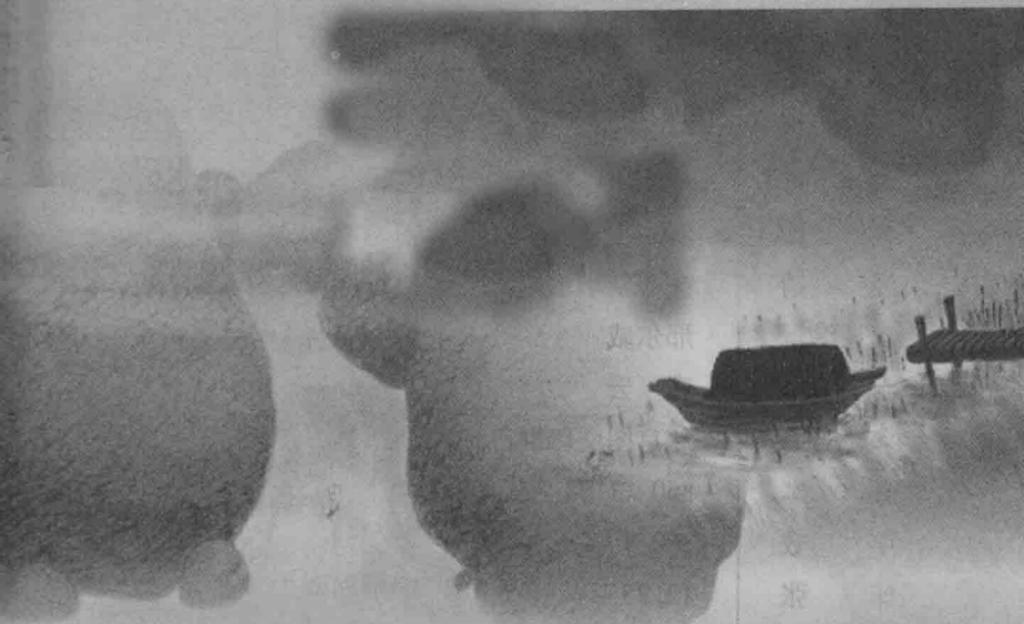
中国文程出版社

铜仁地区

当代作家

评传

郭征帆 著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课题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郭征帆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0

ISBN 7-5059-4069-4

I. 铜… II. 郭… III. 文学 IV. K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66901 号

书名	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
作者	郭征帆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邢尔威
封面设计	青云
印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60 千字
印张	12.25
印数	1-1000
版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4069-4/I.6169
定价	28 元



铜仁地区行政区划



目 录 * 街上即兴采风 散步 第五集

——侯长林评传/281 2018诗情画意——

第十五章 绿柳青枝映水蓝天醉 韩六年

——电子邮箱诗/282 2018诗情画意——

第十六章 喜乐音符妙乐声声春色暖 韩十年

——泰山诗作/283 2018诗情画意——

第十七章 梅竹与雪迎新岁春来早 韩八年

——歌乐山诗传/284 2018诗情画意——

序 /侯长林/1

第一章 姹紫嫣红满园春

——铜仁地区当代作家创作概述/19

第二章 心情漂泊于黑白乐府间

——马仲星评传/42

第三章 强者的脚印

——龙岳洲评传/52

第四章 走出峡谷的乌江

——田永红评传/71

* 每章评传按作家姓氏笔划排序

铜仁地区行政区划

第五章 世纪平民

——吴恩泽评传/108

第六章 烟雨秋色韵无穷

——张子初评传/126

第七章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邵冠群评传/142

第八章 纸上有味纸上香

——欧阳黔森评传/158

第九章 爱在雨季

——林亚军评传/181

第十章 妙笔生花著佳篇

——林盛青评传/199

第十一章 绝地之歌

——郑一帆评传/216

第十二章 探索于乌江两岸

——赵朝龙评传/235

第十三章 生长·追求

——思基评传/252

第十四章 清浪街上的跋涉者

——唐玉林评传/281

第十五章 孤独的太阳

——喻子涵评传/305

第十六章 诗生涪阳 心润八方

——寒山评传/337

第十七章 航行与呼啸

——蔡劲松评传/351

我期待的铜仁未来的文学(代跋)/龙岳洲/366

闲言碎语(后记)/371

何年夏，曾长君以“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为题申报州府2002年度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最初他邀稿于始有稿人，但我对他动吾先述道机深忌，只是附和了他。是今春夏天他邀我评传的一本《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书中稿放在了我的

抽屉里，因我忙于其他事而搁浅。今年，贵州大学出版社拟出版“十五”期间之文学研究之十项成果。

繁荣地域文学 表现地域文化

—序《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

侯长林

两年前,郭征帆君以“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为报贵州省2002年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课题,我给他签署了推荐意见,但我对他能否完成课题还是持怀疑态度,可今年夏天他居然把厚厚一本《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打印稿放在了我的

* 侯长林：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铜仁地区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

案头，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读完了他的这部书稿，给我的感觉是，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一本书实属不易。可以说，征帆君的《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铜仁地区当代作家的著作。尽管这部著作对作家的评价不一定很准确，对所点评的对象的选择不够周全，点评的语言也有待锤炼，但是作者所作的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就像一位拓荒者，虽然挖出的泥土比较粗糙，但每挖一锄都会透出新鲜的泥土的气息。

我们铜仁地区当代的文学创作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但文学评论一直滞后，征帆君的《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一书的出版，将对铜仁地区当代的文学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铜仁地区的作家大都已开始意识到地域特征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征帆君的《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一书是对我们铜仁这块特殊地域里的文学的研究，读了征帆君的书稿《铜仁地区当代作家评传》，欣喜之余，也禁不住想谈谈繁荣地域文学的一些问题。

当前，关于地域文学的讨论已成为文学家们关注的热点，其中，繁荣地域文学的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所以，如果讨论只仅仅停留在对繁荣地域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上，那已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因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要不要繁荣地域文学而是如何繁荣地域文学的问题。因此，我只就如何繁荣地域文学谈谈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如何繁荣地域文学？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我是搞文化研究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何繁荣地域文学实际上就是文学如何反映、

表现地域文化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

第一、地域文化是地域的典型代表。虽然任何“地域”(Region)都是因为地理学上的高山、大河、草原、丘陵等自然环境的不同才形成的，但是这些自然环境只有打上人的印记以后，才有鲜活的生命力，而人一旦踏上这些土地，在这些高山、大河、草原、丘陵等自然环境里繁衍生息，就必然留下人类生活的痕迹。在不同的自然环境里生活的人，必然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存方式必然陶冶、塑造出具有不同性格、不同情感甚至不同思想的人。《汉书·地理志》中对自然环境影响人种作出了精辟分析：“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由此可见，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域人种的文化心理和行为准则。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在不同地域里生活的具有不同性格、不同情感甚至不同思想的人必然留下不同的生活的“痕迹”。比如就人类的居住方式而言，不同的地域就有不同的居住情况，并留下了不同的居住的“痕迹”。在北京这块地域里生活的人，留下了故宫、天安门、四合院等特别具有北京味的建筑方式；在云南傣族生活的地域里，留下了竹楼等特别具有傣家味的建筑方式；在西藏这块地域里生活的人，留下了布塔拉宫等大大小小不同的特别具有佛家味的建筑方式……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所留下的这些不同的生活“痕迹”也就是不同的文化的积淀。因为，生存方式其实就是典型的“文化”。尽管关于“文化”的定义有

几百种,但没有人敢否认生存方式或生活方式不是文化。“文化”的最流行的定义之一就是指“人类的生存方式的总和”。所以,我这里所谈到的“地域”,并不完全是指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类生存空间,也就是说,地球上的以地理性的区划形成的任何一块地域,对我们今天的人类来说,它都带有鲜明的历史的时间意义,都包容和涵盖着人类生存各个历史性阶段所创造的文化积淀的内容。而谁最能反映和最有资格代表我这里所指的不完全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域”呢?显然,只能是在这些地域里生活的人类所留下的文化积淀内容尤其是那些隐藏在自然生态背后的斑斓而深厚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社会的、民族的、历史的、心理的等等文化内涵。因而文学家要创作出特别具有地域味的作品,就必须把目标对准这块地域里的特殊的文化。因此,地域文学不仅是某一地域的“现实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表现者,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化地理”的内在描摹者。据说美国“新文化地理学派”就认为文学家都是文化地理学家,其热门的“解读景观”(the reading of landscape)就是从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两个角度来分析、研究文学的模式的。

第二、地域文化是地域文学形成的根本条件。如果说“现实的自然地理环境”只是地或文学形成的外部条件,那么“地域文化”则是地域文学不可缺少的内在因素,是地域文学丰富内涵的主要来源,是地域文学形成的最根本的条件;没有“地域文化”这个坚硬的“核”,就不可能产生真正具有地域味的文学。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指那种狭义的文化,而是指马克思所说的“人化”了东西,尤其是指人们的生存方式,包

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心理、风俗等各个层面的一切打上了人的“印记”或由人所创造又反过来制约人的行为活动的、内在的人文现象和景观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性、习俗等。王枝忠在评陈庆元的《文学：地域的观照》一文时指出：“文化，它应是地域文化小说丰富内涵的矿藏，它应充分显示出人与文化的亲和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地域文化小说，如果在地方色彩的表现过程中不能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便失去了作品的文学意义，至多不过是一种‘风物志’、‘地方志’似的介绍。因此，作为地域文化小说，它所不可或缺的正是对斑斓色彩的多种文化内涵的揭示，无论你是主观还是客观，这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的广义文化内涵的描写，一定要成为地域文化小说形中之‘神’，诗中之‘韶’，物中之‘魂’，否则，地域文化即失去了文学之根本”。这些看法是很有见地的。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大凡成功的地域文学家无不是以表现地域文化为己任的。鲁迅通过他手中的笔铸造了“五四”文学的民族文化之魂，那种对民族劣根性的深刻的揭示，对“吃人”的文化历史的声讨和诅咒，可以说唤醒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奠定了二十世纪文学以文化为本位、以文化为主体构架的独特的文本模式，尤其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本模式。沈从文以他的湘西风俗画给现代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之风。周作人、林雨堂等开启了文化散文的先河，余秋雨用他的“文化苦旅”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景象。贾平凹带着他的“商州文化”像一匹黑马冲入文坛，使人耳目一新。吴恩泽的长篇小说《伤寒》和《平民世纪》则是他对我们

黔东这块“边缘文化”进行认真研究后的文学表现。田永红、赵朝龙的小说其实就是在向人们讲述神秘的乌江文化。我之所以喜欢宁坤强的散文《走近欧洲》，那就是因为他把他对我们中国这块地域文化所进行的反思写进了他的散文之中。马仲星的文学作品集《黑白乐府》，仅书名就已透露出浓浓的文化味……当然，在整个中国地域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地域文学中的文化消长，是随时代的创作风尚而变化的。但是，无论怎么变化，作为地域文学的母题，“其文化内涵是抹煞不掉的，它已经成为一种小说创作的固态心理”（王枝忠语），是地域文学形成的重要因素之所在。

由此，完全可以说，繁荣地域文学主要在于对地域文化的表现。

那么，地域文学如何表现地域文化呢？下面，我就这一问题，稍稍展开一下：

第一、熟悉地域文化。要反映、表现地域文化，首先得对地域文化进行研究和思考，对地域文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把握其所表现的地域里生活的人的生存方式，尤其要搞清楚地域文化的特点。就我们铜仁这块地域里的文学家来说，就得首先对铜仁这块特殊地域里的特殊的文化有一个大致了解。可能有的人会说，我们作为长期生活在铜仁这块地域里的人，难道对铜仁这块地域里的文化还不了解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生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情况常常发生。更何况我们铜仁这块特殊地域里的文化是我们黔东人民用智慧和汗水浇铸而成的，不是一眼可以看穿的。所以，应对我们铜仁这块特殊地域里的文化进行研究。但遗憾的是我们铜仁的文化人对铜仁这块特殊地域关

注不够,研究不多,以至什么是铜仁文化?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不过,我认为,铜仁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巴楚文化为根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色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铜仁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是云南、贵州通往湖南等东部省市的咽喉要道,同时,也是贵州通往四川盆地的重要通道之一,这就决定了铜仁地区在云贵高原乃至整个西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自古以来,铜仁地区所处的“黔中”就是兵家争夺之地。当时铜仁所处的黔中郡是荆楚之地通往滇池等地的唯一通道。其战略意义可想而知。云贵高原,是自然地理的高地,也是文化的高地。因而,铜仁地区也就成了东西部文化的融会点。铜仁地区文化既要受其背景文化——云贵高原文化尤其是贵州文化的影响,又要受四川的巴蜀文化、湖南湖北等地的荆楚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既要受彭岚嘉所说的属于西部文化的“由山地守猎文化与外来屯堡文化杂合而成的滇黔桂的多神崇拜文化圈”和“由山地农耕文化与来自不同方向的汉族文化结合而成的巴蜀儒道释文化圈”的影响,又要受属于东部文化的荆楚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锦江~沅江流域和乌江流域就是铜仁连接洞庭湖和长江干流的黄金水道。锦江~沅江连接荆楚,乌江接通巴蜀。通过这两条水上通道,铜仁人民把自己的产品连同自己祖祖辈辈积淀起来的丰厚的文化一同运往荆楚等中原及巴蜀地区,当然,他们也通过这两条水道把荆楚等中原及巴蜀地区的文化带回铜仁地区这片相对偏僻的土地,与这里的土著文化交融、碰撞,使这里的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从文化的渊源来看,铜仁地区文化本身就属于荆楚文化,并长期受荆楚

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当然,也要受贵州文化的影响。《竹书纪年》曰:“(武丁)高宗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祀,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易·既济》载:“(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几条记载相互吻合,说的是同一回事,并且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卜辞中的“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之言,即是指前面几条记载提到的征伐鬼方之事。在这些记载中提到两个地名:一是荆,二是鬼方。所谓“荆”,即指后来楚国的荆襄之地,通称为荆楚。而“鬼方”,其地缘和荆相连,在荆之西南地区,含湘西、贵州及云南的昆明等地。春秋时,今贵州地总称为荆洲西南裔,泛称南蛮或荆蛮。而铜仁地区则属荆楚西南部黔中之境。由此可见,铜仁地区自古就属于开发较早的荆楚之地,是荆楚的一部分,只不过偏处西南而已。所以,铜仁地区的文化源于荆楚文化,或者说,春秋以前,铜仁地区的文化本来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部分。此后,铜仁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屡经变迁,行政区划也时常变动。秦时属黔中郡,汉时属武陵郡,西部(今沿河、思南以西)则属巴郡和牂牁郡。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铜仁西部大部归蜀,东则属吴。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北京户部郎中李芝彦署题的《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在描述梵净山的地理位置时,曾这样写到:“窃见梵净山壁立黔南之境,轴连楚蜀之间”。从这些有关铜仁地区行政隶属关系和地理位置的记载情况来看,铜仁有部分区域曾经属于蜀地或直接与蜀地相连。这就决定了铜仁地区的文化必然包含有巴蜀文化的因子,并长期受巴蜀文化的影响。因而,可以说,铜仁地区文化的根在荆楚和巴蜀文化。不过,贵州

建省以后,铜仁地区文化除继续要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影响外,还要受贵州文化的影响。那么,何谓贵州文化呢?按史继忠的观点,贵州文化与中原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一样,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贵州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杂”。这种“杂”,不单是指它的来源极其广泛,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固有的特质依然保存。彼此之间的渗透、交融是有的,但“同化”中有“异化”,“异化”中有“同化”,尽管共性逐渐增多,但个性仍很鲜明。贵州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个缩影,是一种特殊类型,它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多元”不同,并未完全交融为一体,而是“多元共生”。因此,贵州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它包括若干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和区域文化的子系统,乃至分系统。从铜仁文化多姿多彩的特点来看,确实与贵州文化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地方,这种相似或相同的地方,显然,是受其统摄或影响的结果。从各民族迁徙聚居的情况来看,铜仁地区各民族大多是从荆楚之地和巴蜀地区先后移居铜仁的。铜仁地区散居或聚居着苗、侗、土家、仡佬、羌、回、满等30多个少数民族,是多民族大迁徙的结果。就族源、迁徙的情况而言,铜仁地区的各族人民,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从外地迁移而来的,很难分清哪些是“土著居民”,哪些是外来移民,因为,铜仁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区。苗族的祖先是蚩尤。大家都知道,蚩尤是与黄帝齐名的远古时代的英雄,其后裔发展成为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之一的楚国。《史记·楚世家》载:楚国的先君为熊渠、熊通等,他们一向自称是与华夏有别的蛮人,并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政”。《通志·民族